正义者的悲剧

——试论加缪《正义者》中的悲剧性*

刘文瑾

摘　要：后期的加缪认为他所在的时代是一个悲剧复兴的时代，并致力于思考和创作一种现代悲剧。本文通过对其剧作《正义者》的解读，辨析主人公卡利亚耶夫这一正义者身上的悲剧性，指出这个悲剧鲜明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有关悲剧性的阐释，表现了悲剧英雄的道德困境。

关键词：悲剧性　《正义者》　加缪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
人们拥有一切，人们一无所有；
……"①

一个半世纪前，狄更斯在《双城记》写下这个开头。他借古喻今，通过讲述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故事，来反映对剧变中的英国社会的忧思。如今，这些句子正热烈地回响在剧变中的中国时空，它所揭示

* 本文为2015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文学与恶：审美现代性中的主体精神"（批准号：15ZS013）阶段性成果。

① 主要参照曾克明译本，少量字词参考英文原文有改动。

的强烈对照，描绘了此处的世态人心。

这个急剧的社会变革，显然是指现代性进程。从社会学角度，这是著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进入人类生活所引发的一场追求普世价值的浩大革命。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个体伦理道德方面都引起了日新月异的变革。加缪指出，现代悲剧就诞生在这个社会与人心剧变的时代。[①]

此时代的特点，是人伦精神的深刻悖论性。如阿伦特所言：“现代人的实际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到足以挑战宇宙的存在，然而，恰恰是面对这个由他们亲手所造的世界，活在其中并理解其意义，他们却深感无能为力。这种有能与无能之间的反差令人沮丧。”[②]这种反差便鲜明地体现在狄更斯这段意味深长的话中。

一、加缪与现代悲剧

后期的加缪曾尝试思考现代悲剧，因其写作源于生命体验，而他从时代危机中洞悉了悲剧的奥秘：悲剧诞生于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反映这个转折的光荣与危险。[③]

以一流作家的敏锐和激情来钻研哲学和思想史的加缪指出，文明史中曾有过两次悲剧艺术的辉煌，一次是如昙花一现的古希腊悲剧，第二次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拉辛为终结的文艺复兴时期悲剧。“这两个时期的确表明一种过渡，从充满神圣和圣洁概念的宇宙思想形式，过渡到别种形式，即相反由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推动的形式。”[④]无疑，这两个时期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启蒙时代——人从神明的统治下

① 加缪：《雅典讲座：关于悲剧的未来》，《加缪全集·戏剧卷》，李玉民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617 页。

②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1),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p.viii.

③ 加缪：《雅典讲座：关于悲剧的未来》，《加缪全集·戏剧卷》，第 617 页。

④ 同上书，第 618 页。

商務印書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独立出来。悲剧则是这种历史转折时期之电光火石的艺术再现。

从时代转折与悲剧艺术的关联中，加缪想探究什么？探究人的进步，以及进步中的黑暗；探究人的解放，以及解放中的限度。在加缪那里，悲剧就是人们关于进步之痛的表达。进步之痛的症结在于进步中的悖论。这既是理解古希腊悲剧、文艺复兴时期悲剧，也是理解现代悲剧冲突的钥匙。和黑格尔一样，加缪认为，悲剧的特点在于，发生冲突的两种力量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然而，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加缪认为，悲剧冲突的原因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是人的无度——人唯我独尊，试图以自义来彻底否定他义。在加缪那里，悲剧的消除、冲突的解决之道，不是无法避免的死亡的扬弃，而是重新找回人的限度意识，认识到自义的局限——也就是说，承认他义有时也应当得到尊重。因此他说，在悲剧中，“受到惩罚的不是罪恶本身，而是人物否认平衡或紧张的那种盲目性”。[①]“俄底浦斯抠瞎了双眼……他的黑夜就是一种光明，在眼睛死去的这张面孔上，闪耀着悲剧世界的最大忠告。”[②]

在加缪看来，现代悲剧源于现代人关于历史进步、关于人能决定自身命运的无度欲望。人丧失了关于自身存在之有限性的理解，以为自己可以成为神，然而，人所造出的神却成为了另一种敌对的命运，以至于“悲剧跑到了大街上，上了革命的血腥舞台”[③]：“18 世纪的人以为，能运用理性和科学控制并改造世界，而这世界也的确成形，但是成为可怖的形态。这是历史的世界，既合理又无限度，而且无度到如此地步，历史便戴上命运的面具。人怀疑能否控制历史，也只能进行斗争，真是有趣的反常现象。人类从前拿起武器，摒弃了天命；又以同样的武器，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敌对的命运。人造出了一尊神：人的统治，然后又转而反对这尊神了。人处于不满的状态，既是斗士，又不知所措；既怀着绝对的希望，又持彻底怀疑的态度，因而生活在

① 《加缪全集·戏剧卷》，第 622 页。

② 同上书，第 623 页。

③ 同上。

悲剧的氛围中。”[1]

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在20世纪极权政治的阴霾中思考的加缪，与另一位在法国大革命硝烟后严肃思考的德国作家荷尔德林的不谋而合之处：在同样欢呼革命带来的解放后，他们都同样转向了对革命的失望和疑虑；在同样赞美了他们的精神家园“南方”（希腊）的健美与活力之后，他们都同样从关心审美转向关心悲剧；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盛赞希腊人拥有反思和节制的美德，视之为现代人的良药。[2]他们思想中的这些相似绝非偶然，而是说明在面对“自由”、“解放”之难题时，人类常常不得不面对相似的历史困境，从而求诸相同的精神资源。

加缪说：“我们的时代恰逢文明的一场悲剧。”[3]何为他在这场悲剧中的切肤之痛？何为现代悲剧的苦难与智慧？他的五幕剧《正义者》（1949）和长篇随笔《反抗者》（1951）最能给予直观透彻的说明。《反抗者》不仅在文中多处指涉和评论了《正义者》，亦可被视为对《正义者》在理论上的延伸性反思。众所周知，正是《反抗者》的出版造成了加缪和萨特的公开决裂。在《反抗者》中，加缪由对历史进步之痛的敏感，而主张以“纯粹反抗”来反抗将革命暴力合法化与极端化的反抗，最终则不得不与萨特分道扬镳，并受到萨特的尖刻批评。萨特不但指责他逃避现实的菜鸟立场，也挖苦他的哲学能力。彼时，作为存在主义大师、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政权在法国知识分子中的代言人，萨特在思想界的影响正如日中天。而加缪竟然质疑使萨特和波伏娃们上瘾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这不啻于开时代倒车，其中年落寞便在所难免。[4]

---

① 《加缪全集·戏剧卷》，第624页。

② 此处有关荷尔德林的生平与思想，参考了《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威廉·狄尔泰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体验与诗》，胡其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以及勃兰兑斯的《荷尔德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刘半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③ 加缪：《雅典讲座：关于悲剧的未来》，《加缪全集·戏剧卷》，第620页。

④ 参见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二十世纪》第二章“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阿尔贝·加缪和暧昧的难堪”，章乐天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二、正义者的爱与痛

《正义者》[1] 回荡着雨果《九三年》的余响：两部作品中都有革命的利器能否殃及孩子的尖锐冲突，都有革命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残酷交锋，以及最终吞没了革命理想的死亡黑暗。

在《九三年》最后一幕，雨果以诗人的笔触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图尔格（绞刑架）面对着断头台。“拉·图尔格就是君主制度，断头台就是大革命。悲惨的对照。”[2] 断头台是图尔格犯下的累累罪行的复仇者。“倒下去的权威害怕新起的权威。犯罪的历史在打量着司法的历史。过去的暴力在和今后的暴力比美……昨天在今天的面前战栗了，过去的残暴证实了而且忍受了新生的恐怖的存在，已经降低为零的东西在真正的恐怖面前张开了阴暗的眼睛，幽灵在注视着鬼怪。”[3] 这也正是狄更斯在《双城记》、加缪在《正义者》中揭示的革命困境：一方面，革命是出于正义而不得不进行的反抗，另一方面，革命的暴力在反抗邪恶中产生了邪恶；一面是革命的正义，另一面是革命的不义。正是这种革命的悖论性构成了革命的悲剧性。

《正义者》便是这样一出取材于历史、充满了痛苦惶惑的悲剧：年轻的诗人和革命者卡利亚耶夫参与暗杀小组任务，奉命炸死大公，然而当他手拿炸弹对准大公疾驰而过的马车时，看到马车上坐着的孩子——大公的侄儿侄女，他的手颤抖了，于是冒着重大危险，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后来，他终于再次获得机会炸死大公，然而却不得不面对虔敬仁慈的大公夫人。他依然未能摆脱良心的巨大不安和面对上帝的自责，于是一心一意走向行刑架上的死亡。

卡利亚耶夫就像另一个俄狄浦斯，他希望有所作为来改变人类的

① 本文有关《正义者》的引文皆出于《加缪全集·戏剧卷》，前揭。

② 雨果：《九三年》，郑永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第 364 页。

③ 同上书，第 365 页。

不幸命运。然而，在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正义理想行动时，他却处处感到了与正义的违拗：在诗人的革命性与恐怖分子的革命性之间，在使人愿意为之牺牲的信仰与复仇嗜血的冷酷暴力之间，在反抗专制政权与谋杀眼前具体个人之间，有那么多似是而非、难以决断之处。甚至在正义与爱之间，似乎也有着绝对的冲突和无法逾越的界限。

热爱生活的卡利亚耶夫渴望健全的正义。在危急时刻，他毅然做出了自我牺牲的选择，放下了对准孩子的炸弹。他十分清楚：人活着，不但靠正义，也要追求良心的清白。“革命要脱离荣誉，我就会脱离革命。”“如果为了一个我没有把握的遥远国度，我不会迎面打击我的兄弟。我不能为了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但尽管如此，他依然无法避免正义与爱之间的撕裂，无法避免为了正义而采取的流血暴力行动在他渴望美善的心灵中激起的痛苦。

经过了第一次失败的暗杀行动后，卡拉亚耶夫明白了暗杀并不像他原先设想的那么简单：“现在我才明白，仇恨中没有幸福。这种痛苦，在我身上，在别人身上。”但他劝说自己“走到底，走得比仇恨还远”，走向“爱”。而他的爱人和另一个自我——女革命者多拉——却告诉他这不是爱：“流血太多，暴力行为太多。真正热爱正义的人，是没有权利爱的。他们都训练成我这样，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在这些自豪的心中，哪有爱的容身之处？爱，雅奈克，就是微微低下头，可是我们呢？我们的脖颈子都是僵硬的。”

卡利亚耶夫坚持说：“我们爱人民”。多拉则提醒他，这种所谓的“爱”，也许只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象：“我们对人民的爱虽然博大，却没有依凭，是一种不幸的爱。我们要远远脱离人民，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湎在自己的思想中。再说人民呢？他们爱我们吗？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吗？人民都沉默不语，多么寂静，多么寂静……”

在多拉看来，人民过于抽象，只是一个概念，而非爱的对象。爱的对象，应该是具体个人。爱，应该发生在一个具体个人和另一个具体个人之间，有彼此的回应，而非一种抽象观念。至于卡利亚耶夫所

向往的那种爱，对人民“全部奉献，全部牺牲，不图回报”，多拉说：“这是绝对的爱，纯洁而孤独的欢乐，这正是使我们神魂颠倒的爱。然而有时候，我心里不禁琢磨，爱会不会是另外的样子……我想象那种情景，你瞧，阳光灿烂，双方的头都微微低垂，心摆脱骄傲，手臂都张开……这就叫作温情。可是，你有真正的体会吗？你是怀着温情热爱正义吗？……你热爱人民，是这样心驰神往，温情脉脉，还是相反，怀着复仇和反抗的怒火呢？”

多拉指出了两种爱、两种正义的根本差别：一种是怀着温情热爱正义，一种是怀着怒火热爱正义。而在我们这个早已被非正义毒化的世界上，要想避免怀着怒火热爱正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雨果在《九三年》中揭示的那样：我们的世界充斥着断头台对抗图尔格的不幸场景。断头台既是图尔格的复仇者，也是它的女儿。断头台是从图尔格统治的这片不幸的土地中孕育出来的：“凶险的树在不祥的土地上萌芽。这片土地上洒过那么多的血，那么多的汗，那么多的泪珠；挖过那么多的沟壕，那么多坟墓，那么多的地洞，那么多的陷阱；腐化过牺牲在各种各样暴君手里的尸首；掩盖住那么多的深渊，这些深渊里埋葬过那么多的罪恶——可怕的种子；就是从这片深厚的土地里，在注定的日子，这个陌生的东西，这个复仇者，这个凶猛的杀人机器走了出来，于是九三年就对旧世界说：‘我在这里了。’”[①]

应该承认，革命和正义的诉求，从一开始就已经带上了不幸命运的诅咒，是从一片被非正义污染的土地上开出的花朵。这朵花是否会是一朵罂粟花？它如何能够将自己从诞生前就已摄入血液甚至基因里的毒素洗涤干净，从而带给人们美善与希望？这，正是卡利亚耶夫的难题。除非他从一开始就让自己彻底摆脱这个难题，摆脱革命和正义的诉求，要么一切皆空，要么独善其身。然而，在一个充满不义和苦难的世界上，如果卡利亚耶夫选择一切皆空或独善其身，他就不会是

① 雨果：《九三年》，第 365 页。

正义者，也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而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必然关心正义与未来，无法置身于世界的不义与苦难之外。

卡利亚耶夫满怀赤子之心，只是很难维护正义与爱的两全或平衡。一如多拉所言，“在正义和监牢中，这种爱显得有点儿奢侈”。在一个被不义与苦难毒化的世界里，那种对正义充满温情的爱，从何而来？怨恨苦毒是世界的另一个牢笼，囚禁了温暖和希望，却释放出恨的能量。多拉只能哀叹：“我们处于漫漫无期的冬季，不属于人世，因为我们是正义者。世上有温暖，却不是给我们的。噢！可怜可怜正义者吧！”然而，谁能可怜正义者？正义者又会接受怜悯吗？卡利亚耶夫最终认定：“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份额，不可能有爱的位置。”这是卡利亚耶夫对命运的屈服，只是此时，命运以另一副面具登场：命运就是无爱的正义、痛苦绝望的正义。

这出悲剧揭示了，对于有限的人类而言，爱与正义之间常存巨大的鸿沟。卡利亚耶夫似乎只能要么牺牲爱，去追求正义，要么舍弃正义，来俯就爱。他仿佛注定了无法拥有爱和正义的完美结合。而唯有这种结合，才是整全的爱和整全的正义。卡利亚耶夫是一个悲剧性的牺牲者，他的牺牲仿佛是命运的嘲弄。然而，与古希腊悲剧英雄不同的是，他有一种圣徒气质。这种气质体现于加缪在《正义者》开头的简要介绍：“他们在最残酷的任务中，未能消除良心不安。”但这种圣徒气质只是加深了卡利亚耶夫的悲剧性：他屈服，却又无法完全臣服于这新的命运。他仍然对爱敏感，因此无法避免遭受理想与命运之强烈张力的折磨，只有希望死亡——特别是自愿走向绞刑架的死亡，能够成为一种解脱。

三、正义者的伟大与不幸

戏剧第四幕，大公夫人的出现将卡利亚耶夫的悲剧性推向高潮。大公夫人以自己的悲痛、仁慈与虔敬，再次如多拉一般，向卡利亚耶

商務印書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夫揭示出他正义的局限。首先，他的正义只是他个人的立场，并不能代表绝对正义。如同大公夫人所言，大公也有自己的正义；而他视为敌人的大公夫人，也信仰一位仁爱宽恕的上帝。那么，该由谁来裁决他们之间的冲突？谁又能最终合法化他对大公的谋杀？这谋杀是否能同正义划上等号？

其次，在卡利亚耶夫那里，“对人类的爱”最终只能是一种绝望，而活着，终将成为一种不幸。他将“对人类的爱”窄化为对不义的仇恨、反抗与毁灭，而人类永远都无法摆脱，或者彻底摆脱卑鄙和不义。因此，正义与不义只能如他所说的，“同归于尽”。卡利亚耶夫绝望地说：“今天相爱的人要想相聚，就必须同死。非正义把人拆散，耻辱、痛苦、对别人造成的危害、罪恶，都使人离异。生活就是一种刑罚，既然生活把人拆散。”如此，他“对人类的爱”便注定只能与人世隔绝：“离开这个丑恶的世界，我将沉醉于充满心中的爱。”而在这个丑恶的世界里，人们只能在痛苦中相爱，被“痛苦”这条绳索“系在一起”。同样，他“对人类的爱”也注定只能与上帝隔绝——“我不指望同上帝相会了”——因为此世的教会没有像正义者希望的那样行善，“它把恩典留给自己，让我们去行善”。正义者灵魂的爱欲是如此尖锐、纯洁，以至于唯有死亡的孤独才能成全。

大公夫人，这个虔敬仁慈的女子，希望在个人的巨大悲痛中，给予他宽恕，将他带回与上帝和人世的和解（“鲜血把我们隔开了。然而，您可以到上帝那里，就在发生不幸的地点同我会合，至少和我祈祷吧”），卡利亚耶夫对此感到了一种颠覆性的不适。正义者已经逐渐适应了仇恨的黑暗洞穴，和解的阳光会带来恐惧眩晕。就像《悲惨世界》中那位追捕冉阿让几十年的警长沙威，他在面对冉阿让给予自己的饶恕以及自己所回报的饶恕时，同样感到了无比惊愕：“一种说不清的上帝的正义和人的正义是背道而驰的。他看见在黑暗中可怕地升起了一个

生疏的道义的太阳，他感到厌恶，但又眼花缭乱。”[1]“幸好”，此时，警长斯库拉托夫“及时”到来，给卡利亚耶夫解围，卡利亚耶夫如见救兵。“刚才我真需要您”，因为“我需要重新鄙视”——正义者从容赴死的勇气，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人间的鄙视。

卡利亚耶夫如愿走向了绞刑架，“让死亡给我的事业戴思想纯洁的桂冠”。接下来，将由他的爱人多拉接过这可怕的“桂冠”、这需要用暴力和死亡来维护的“纯洁”。多拉是卡利亚耶夫的另一个自我，只是，或许作为女人，她比他更多了一些温情，但也因此更具悲剧感。因为，她从死亡的冰冷中已经感到了那种让仇恨凌驾于温情的正义的可疑：“如果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亡，那么我们就没有走在正道上。正道，就是通向生活、通向太阳之路。人不能总是冻得瑟瑟发抖……”

多拉担心这种正义能否真正通往他们所希望的救赎之道，担心事与愿违：卡利亚耶夫不仅自己白白死去，也会让别人白白去死；这种正义会被利用，成为暴力的借口。她怀疑对于有限的人而言，那种承担起全世界的不幸与苦难的愿望，是否也是一种骄傲，而“正是这种骄傲将受到惩罚”。骄傲的人是不懂得爱的。爱，应当是“头微微低垂，心里摆脱骄傲”。但骄傲的人可能会过分执着地拥抱正义，因为正义能让人“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心中充满自豪。温情脉脉的爱，使人显得软弱卑微，而充满自豪的正义，则使人显得坚强伟大。多拉的悲剧性在于，她既像卡利亚耶夫一样投身于正义，又比他更难以割舍温情脉脉的爱，最终只得承受比他更疼痛的撕裂。该怪她是女人？

“女人，你的名字是脆弱”，这句名言向来易被人囫囵吞枣。细究起来，《哈姆雷特》中，复仇王子在悲愤中说出这句话，既是由于他母亲对无可指摘的丈夫不顾廉耻的背叛，亦是他对人世充斥着诱惑不义深感绝望的表达。这里的脆弱，不是指生理、心理或社会地位等

① 雨果：《悲惨世界》，李丹、方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308 页。

方面，而是指道德品质。但我们大可不必因此急着给莎翁贴上男权标签。哈姆雷特这句话，并不单单针对女性。在莎翁的世界，女性的道德状况只是男性的一面镜子。

《正义者》中，女人的脆弱体现了一种道德品质，但却有积极的内涵。这种脆弱是由于怀抱温情与希望：对生命和爱人，多拉无法做到英雄气的刚硬和决绝，除非，她如同剧末所问的那样——“现在我还是个女人吗？”。她关怀世界的苦难胜于个人幸福，她隐忍而富有牺牲精神，她付出爱也渴望被爱，但她既不想自己成为英雄，也不希望别人去做英雄。英雄过于伟岸挺拔的不朽身影，可能会遮蔽人类生活所需的阳光。英雄爱的是“人民”、“人类”，而她只爱人和面孔。她不想成为比自己更“伟大”的人。那种“伟大”过于寒冷，容不下一丝温情；那种义无反顾需要某种绝望的疯狂。而多拉会怜悯会哭泣：“噢！可怜可怜正义者吧！”

加缪通过女人多拉发出了自己灵魂的声音。此时，女人的脆弱代表一种更有生命和智慧的爱欲，因为这种脆弱承认人生存的有限性——一种矛盾的、被撕裂的处境。加缪说：“从此意识到人及其历史的含混性，这样的人便是出色的悲剧人物。”[①]

让每个渴望在滚滚历史洪流中成为英雄的现代人，于惊涛骇浪中，忽而瞥见人类及自身的苦难和脆弱，并发出一声祈求，这就是现代悲剧的智慧。

四、结语：悲剧作为道德困境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一直强调悲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应当具有鲜明的“好人”特色。这里的“好”，是指“khrēsta”、“spoudaios”，有“earnest（认真的、诚挚的、热切的）”，以及（同

① 加缪：《雅典讲座：关于悲剧的未来》，《加缪全集·戏剧卷》，第 623 页。

类事物中）“优秀的”之意。[1]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好几处指出：“悲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人好的人”[2]，“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3]，甚至是“比我们好的人”[4]，“性格应该好”[5]，等等。另一方面，悲剧人物的“好”是有缺陷的。“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这些人声名显赫，生活顺达，如俄底浦斯、苏厄斯忒斯和其他有类似家族背景的著名人物。”[6]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悲剧人物的“错误（harmartia）”，历来是《诗学》研究中的热点。戴维斯在其逐句解诂《诗学》的著作中指出，悲剧人物的“harmartia”“似乎与他们对道德原则之微妙模糊缺乏意识有关（……）一方面这样的人并不是有德者；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太道德（……）通常对自己很有把握且充满道德义愤”。[7]也就是说，悲剧人物的缺陷不在于缺乏道德感，而在于一种道德上的天真。与之相较，被亚里士多德视为由于具有完美德行（“epieikes”公允）而不适于作为悲剧英雄的人，则是比悲剧英雄在道德感上更有节制的人。epieikes“是一种比正义（justice）更公允（just）的德行，因其会匡正普遍法律必然具有的不精确性。因为深知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总是公正获胜，epieikes 的特出之处表现在所求少于其应得。Epieikeia 因而是道德，同时又是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批评。”[8]

---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113 页注 3；〔美〕戴维斯：《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年，第 99 页。

②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 38 页。

③ 同上书，第 97 页。

④ 同上书，第 113 页。

⑤ 同上书，第 112 页。

⑥ 同上书，第 97 页。关于这句话，戴维斯《哲学之诗》一书中译为“这种人既不因为德行和公正的突出，也非因恶行和缺德而转向厄运，而（此人运道的转变）是由于某种错误，这是一个像俄底浦斯、苏厄斯忒斯那样声名显赫（有伟大意见），气运亨通，且有类似高贵家族背景的人。”〔美〕戴维斯：《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第 99 页。

⑦ 〔美〕戴维斯：《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第 99 页。

⑧ 同上。

商務印書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因此，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认为，悲剧展现了主观上“好（khrēsta）”的道德意图与客观上“好（epieikes）”的行动之间的鸿沟。Hamartia就是这个鸿沟表现。此鸿沟让我们看到“好（khr ē sta）”人在坏的环境和运气中的脆弱，看到在一个缺乏公正、充满暴力的世界上，单纯“好（khrēsta）”的道德激情有时非但不能保证幸福，甚至不能保证自身的可靠。由此，悲剧让观众在恐惧和怜悯的启示中，发展出一种对自我和共同体更为丰富的理解：一方面，道德理想的实现有赖于整体社会道德境况，因此有关道德选择和行动的考虑需要包含节制与限度的考量；另一方面，道德理想有时会堕落，甚至只是一种错觉，因此人的德行需要在对自我不断地再认识中形成。德行包含了灵魂知情意全部要素间的和谐。

在加缪的《正义者》中，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作为道德困境的揭潴在现代舞台上呈现出来。如果说卡利亚耶夫还只是一个孤独的、带着现代悲剧色彩的道德理想主义者，那么此后，现代悲剧以一种集体性方式上演，道德理想则沦为了一种自欺与欺骗。

商務印書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